

文憑社會：高校擴張與文憑貶值及其他

◎ 陳心想

一 文憑社會

1978年日本學者矢倉久泰出版了《學歷社會》，1979年美國社會學家科林斯出版了《文憑社會》。這宣告了文憑社會的到來，也即是學歷社會的到來。在現代社會，學歷和證書逐漸鋪天蓋地而來，令人有窒息之感。儘管科舉和管理國家在古代中國密切相關。但學歷和證書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行各業則是為期不遠的事情。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經理階層變得專業化，學歷幾乎成為企業挑選經理的前提條件。現在領導幹部知識化，也要有學歷。學歷標誌的就是加利·貝克爾所謂的「人力資本」。為了製造更多的學歷和證書，高校和各種培訓機構出現並擴張了。但大學的擴大不會消滅學歷社會，將如貝爾所說，「到那時，最為重要的是知識社會本身的內部分別。（它）將永遠持續下去並永久存在。」

二 面對文憑社會，高校的擴張

文憑市場的需求愈演愈烈。以研究生教育為例。2005年報考研究生的人數突破百萬大關，再創新高。回頭看看過去數年的情況，中國研究生入學考試競爭確是愈來愈激烈了。下面一組過去幾年裏全國報考研究生的人數統計數據就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報考人數（萬）	24.3	27.4	31	39.2	46	62	79	94.5

為了滿足社會教育市場的需求，高等學校擴招了。2005年全國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招生人數將達到475萬人，比去年增長8%。2005年全國研究生招生總數為37萬人。研究生招生總數中，碩士研究生招生31.6萬人，比上年增長15%左右，博士研究生招生5.4萬人，比上年增長2%。1998年的研究生報名人數不到28萬，2005年增加到突破100萬，是1998年的大約4倍；招生人數由大約8萬增加到37萬，大約是7年前的4倍多。

這種競爭高學歷現象的背後是甚麼呢？就業壓力、經濟富裕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自身素質、找份高薪工作、進一步獲得提升等等，都成為理由。但是最本質的是教育文憑和社會分層的相關性太大了，也就是教育文憑和利益直接聯繫起來，高文憑，高利益。古今中外，甚麼東西能夠帶來名譽利益，必然群焉趨之。隨著所謂的知識經濟和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在人們的頭腦裏扎根愈來愈深，學歷和文憑的神話自然難以打破了。科林斯在其1979年出版的《文憑社會：教育和分層的歷史社會學》裏就揭露了技術精英的神話。名義上人們求高學歷是為了學習知識和技術，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這樣，許多高學歷和高職位聯繫在一起了，高學歷文憑是獲得高職位的

敲門磚，因此是為了這塊敲門磚而去拿那些高等文憑，不是為了甚麼知識和技術。許多職位並不需要碩士博士，一般人就可以了。但是為了抬高老闆或者機構的地位和價值，招人就是非研究生莫談了。

教育和社會分層關係密切。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個好現象，靠文憑和證書獲得高的身份和地位比了當年靠揭發檢舉「革他人命」而飛黃騰達好多了。《叫魂》作者孔飛力在故宮查資料時和一個老紅衛兵談話，那老紅衛兵很不滿意現在的社會，因為，現在幹甚麼都需要文憑和證書，不是當年靠打倒別人就可以升官發財了。老紅衛兵的失落也正反映了學歷社會的好處的地方。

但是，學歷社會迫使教育擴張導致水漲船高，文憑貶值。拿本科文憑的人多了，用人單位就提高了條件，非研究生不要。有了博士文憑，我們還要博士後。有順口溜說現在是：「學士不如狗，碩士滿地走，博士還可抖一抖。」於是，大家爭相考研讀博。隨著高校的擴張，雖然學士不如狗，但是，如果本科文憑也沒有的話，求職提升時不更糟嗎？這樣，本科教育越是普及，一個青年越是要力爭至少讀個本科。這是個社會鎖定的事實，就像孫立平先生在《斷箭》裏分析的那樣，弱勢群體在社會裏要落隊了。如果不想被大社會甩出去，就要去求高學歷文憑和各種資格證書。這不可避免的結果是殘酷的競爭，愈演愈烈。

研究生報名人數也是逐年遞增，好在招生也在擴大。那麼多科舉考生年年備考，讀四書五經，是社會的一種人力資本的浪費。現在這種情況依然如此。比如高三複讀生，「考研專業戶」等。擴招造成了文憑貶值的後果就是社會巨大的浪費。科林斯是教育膨脹和文憑貶值帶來社會浪費觀點的代表人之一。他認為貨幣貶值造貨幣的代價不高（當然他不是經濟學家，不去考慮諸如社會後果帶來的浪費和低效問題），而培養一個人拿到文憑是代價很高的，是一種很大的浪費。他在一篇訪談裏說，麥當勞的普通員工也要有博士學位才能做嗎？但是，這個分層的社會，人要往高處走，何其無奈！在文憑可以帶來「黃金屋」和「顏如玉」的情況下，人們怎樣才能走出「唯有讀書高」的「教育情結」？

三 文憑社會裏的農村孩子失學問題

在文憑社會裏，文憑是那麼重要，學歷是進入高級體面職場的入場券。那麼，如果我們把眼睛轉向廣大農村，我們會看到一個很複雜的圖像：一方面農民們含辛茹苦省吃儉用供子女上學，以求鯉魚跳龍門；另一方面，大量的中小學生因經濟原因或者升學無望，或者認為即便考上也上不起，或上了大學也難找工作的觀念而輟學。於是農民的經濟地位和前途的關係在文憑社會裏更凸顯了。布迪爾在《國家精英》裏揭示了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是如何共同作用再生產了社會統治階層和下層人民的。通過教育系統文憑制度，森嚴的社會等級制度得到了掩飾，把置根於經濟與政治等物質權力的那種歷史武斷的社會秩序轉變成文化精英階層們溫文爾雅之外部表現。社會等級制度作為衡量社會成員優秀與否的尺度，使一部分人獲得了社會尊嚴，使另一部分人淪落下層。像布迪爾的母校巴黎高等師範學院這樣的「知識份子精英學院」，是培育法蘭西高級知識份子的溫床。學校的入學要求是要有很好的文化修養和學院氣質，而這些正符合那些來自於資產階級貴族的學生。培養出了文化資本家。而像高等商學院和巴黎綜合工科學校等高校旨在培養國家與工業界的領導者，吸引的學生則主要來自於、也注定了是經濟富裕的法國中產階級上層家庭。法國的國家管理學院定位在上述兩種精英學府的中間，重點培養內閣成員與高級社會服務人員，既注重文化能力，又強調經濟能力，招收的學生主要來自於那些罕見的既有世襲財產又有文憑的家庭。

其實布迪爾的這種出身決定人生前途的基本思想，早在費孝通的一篇其落款日期1943年7月3日《遺傳和遺產》裏就有了。只是布氏的是系統和有詳細證據和實證材料的學術著作，費的只是一篇雜文。費說，「若是你願意分析一下成敗人的歷史，除了少數例外，大多數可以把他們成功的原因歸功在他們父親們給他們的遺產。尤其在一個平治的社會中，若是你父親沒有給你留下一筆可以使你有二十年不必工作的生活費，你就別夢想有進入學校的機會。不進學校，即使你自己很用功，卻總得不到一個畢業的資格。很多位置是不允許沒有這資格的人去佔有的。從表面上說，以學識來選擇人才是最合於優生的原則了，但因入學的先決條件在經濟，於是最後決定著仍是遺產。」費舉了當時英國的例子，根據托尼的計算，英國歷任閣員中，除少數例外，都是出於英國四個有名的中學。這些學校學費極其高昂，平民子弟是無緣進入的，從而斷送了他們的仕途宦運。中國的情況呢？費先生根據自己在當時中國農村的調查說，「我在農村裏調查過不少實例，我的結論也是無法承認一個吃苦的農夫做了一生牛馬能創立一個可以養老的家業。你要生活優裕，記著我的話，你必須有個好爸爸。他給你一筆財產之後，你才有資格講努力講拼命。」現在的中國呢？從大量失學的農村中小學生的事實，我們認為布氏和費先生文章中的道理依然沒有過時，覺得還是那樣的鮮活。

可以改變一下這種局面嗎？怎樣才可以讓沒有個富爸爸的孩子依然可以進學校受教育，有資格講努力講拼命呢？以我本人的經歷來看，希望還是有的。希望還在於制度的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可以影響這種不公平和不平等。我這一代人中像我這樣的地道農家娃子是大大受惠於中國的教育制度安排的。我小時候我家是貧困農村裏的貧困戶之一。1983年入學小學一年級書錢學雜費才兩塊。因為我家是貧困戶春節時學校又退還一塊，給家裏過年用。上初二的時候，差一點就去徐州打工，走上盲流的漫漫長路。幸運的是，當時學費不高加上學校對我的特殊照顧，我堅持了下來，並且初三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等師範學校。以當時的中師待遇，順利地念了三年，保送上了師大，也不收學費。直到到北京公費讀研究生，我都一直受惠於國家的教育制度。現在回想起來，覺得自己很幸運，趕上好時機。現在即使扣除物價上漲部分，我家鄉的中小學收費比我那時候高多了。而且各種復習資料學習用品的攤派也很厲害。這樣做對農村孩子很不公平。不能因為他們的爸爸窮而使得他們失去了天資應該發展的機會。雖然像布迪爾和費孝通說的情況我們實際上難以完全避免，但是我們努力改善改善還是可以做到的。仔細想來，僅就農村孩子而言，國家辦好九年義務教育是多麼重要；同時希望國家能為家庭貧困的大學生設立完備的貸（獎）學金制度。具體辦法的探討，不是這篇小文的任務。

四 文憑與信任

從詞源學上看，文憑（Credentials）的詞根是credere，有信任的含義。我們說現代社會生活依賴於兩大「系統信任」，其一是貨幣系統，其二就是以學歷為基礎的專家系統（鄭也夫《信任論》）。但是現在是「真的假文憑」和「假的真文憑」都應運而生了。所謂「真的假文憑」就是人大天橋中關村大街到北大西門一路上文憑販子賣的文憑，確實是假文憑。所謂「假的真文憑」是那些老闆官員們，秘書代上課寫論文畢業從學校拿到的真實的大學裏的文憑，製作和辦理機構是合法的，真的，但從含金量實質而言，是假的。對於治理假文憑，「真的假文憑」好治，以後可以有個系統，電腦上去查；而且用人單位只要不是傻子，肯定會辨認出來的。我見過有人買的假文憑，蓋的章質量很差的。更重要的是治理「假的真文憑」，是個制度體系問題，頗不容易。

另一點，對大眾來說，學校師生對待文憑的態度，對公眾產生對文憑的信任感很重要。在西方

社會，像英美這樣的國家，畢業學位的授予是非常隆重嚴肅的。任何一個參加過英國或美國主要高等學府學位授予典禮的人，都不會不震撼於他們那種古典式的虔誠。各種設計的大同小異的博士碩士服裝和帽子，師生穿戴齊備，像大主教在教堂舉行教會神聖禮儀，教授們莊嚴地授予畢業生學位文憑。在國內我念了本科，還念了一個碩士，從來沒有參加過畢業典禮和學位授予儀式大會。不是我偷懶不去，而是沒有，就是班級學生幹部把證書一摞抱過來，大家領了。也或者是班幹部作代表參加了，而我這個普通學生是不知道的。沒有一點神聖莊嚴的感覺。在美國我還沒有畢業，但參加過別人的畢業典禮。他們不僅自己參加，而且還有親朋好友，人生一件大事，儀式莊嚴而隆重，不必多言。通過這些，使人們對文憑增加信任感。不然，視同兒戲，如何可信？！

五 文憑與考試

科舉累人及其無法克服的局限。近來我手邊有本《湘鄉曾氏研究》，隨手翻了翻。發現科舉之路對不少的有才華者來說，著實是一大不利。曾國藩家族除了曾國藩本人是科舉之路的成功者外，曾的幾個弟弟和子侄輩大都是避開了科舉之路而成就一番功業的，而走科舉一路的則不易獲得發展。比如，曾紀澤和曾紀鴻兄弟兩個的路子選擇就造成了明顯不同的結果。曾紀澤雖然才分頗高，但是考運卻始終不佳，兩次應試，皆告落第，因此他絕意企求科舉，轉而專注於經世致用的學問，還自學了外語。後來出任駐外大使，成為一位值得稱道的外交家。而他的弟弟曾紀鴻，自幼即十分聰穎，他年紀很輕時就以神童的姿態考取秀才，在算學和天文上都做得不錯，而且通洋務，以他的資質才學，應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但是選擇了科舉的路子，一再落地，鬱鬱而終，年僅三十四歲。

考試的局限是考試本身的邏輯的結果，這就是關於考試的內容和效度的問題。關於考試的內容和效度的爭論，已有很長的歷史（參閱鄭也夫《信任論》）。科舉中的關於考試內容和效度的第一場爭論，發生在唐代，辯論的問題是明經科（主要考儒家經典）和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孰優孰劣。考儒家經典主要是記誦的本領，詩賦才能分別出創造性的才華。所以進士科最終佔了上風，也成就了大唐的詩作的燦爛輝煌。但是在評卷時，考記誦儒家經典就容易客觀，詩賦的高低評價就頗為困難。所以辯論依然綿延不絕。於是在宋代發生了第二場爭論，主要發生在范仲淹王安石和司馬光蘇東坡為代表的兩派之間。前者認為辭賦對治國無用，因為當時是用儒家經典來治理國家的。後者則認為靠考試記誦儒家經典不能更好的測試出智力和才華。雙方都有道理。他們沒有想到更沒有做到的是後來經學，義理和詩賦，美文融合在了一起，成了支配明清兩朝的八股文。

但是直到今天，這場古老的爭論還在進行著，因為考試本身的邏輯是，有用的東西未必適合考試，適合考試的東西未必有用。而且，就像進化中的自然選擇一樣，通過一場考試的篩選，留下來的只是適應了這次考試，而不一定適應以後，而有些可能如果被選中了而前途無量。但是，大批量的商品式的生產學生，生產大學生，篩選人才必須有個眾多人員參加的標準化考試。這種考試往往是考一些無用的東西，或者不能很好的識別出人才的東西。這種考試很可能就把哈耶克所說的「頭腦糊塗型」的人給淘汰掉了。因此那些考試狀元們，尤其那些高考狀元們，不必為了得了這個狀元而自傲的不得了。要知道古來對人類做出偉大貢獻的人中有幾個是狀元。成不成才，路還遙遠。仲永同學是前車之鑒；落榜生要爭取還有學習的機會，也不一定是在學校裏學。但現在是個文憑社會！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一期（2005年8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